

论中国的经济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

杜恂诚

内容提要: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性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西方社会,而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非经济因素不同于西方社会,假设条件不符,因此不能简单、直接地照搬这些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必须先进行适用性检验,如果可能的话,需要进行假设条件的创造性转化。中国的经济史学的一般目标,是在研究近当代中国经济史时,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限制、校正和还原,研究被一般性理论所抽象掉的非经济因素,即历史文化特征、制度约束条件等。本文反对把经济理论看成是无条件的、不变的和绝对的,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不应满足于用中国的历史数据来证明某个西方经济学模型的正确性和普遍适用性,或者模仿西方学者发表过的某篇论文的样式,来一个“拷贝不走样”的“中国版”,并认为不宜用现代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发展基础和约束条件完全不同的古代社会。中国的经济史学的最高目标是理论、历史、统计三者高度融合,参与开创适用于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学派。

关键词:经济史学 主流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中国国情 理论、历史和统计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能否自然而然地就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

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和西方世界的地域范围内,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经济学说中占有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理论派别。其主导地位或者表现为它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或者是作为官方经济决策和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石,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西方主流经济学往往不是单一学派构成,而是多种不同思想流派兼容并蓄的多元集合体。它有三个主要的共同特征:一是数学形式化,二是个人主义方法论,三是忽略基础不确定性,即不考虑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问题,或者将之简化为逻辑时间和风险问题。

关于经济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关系,已有很多人作过研究,尤其是已故经济史学大家吴承明老师的论著,如《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论历史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等,更是经典之作。^①笔者在给学生上课、写文章和编教材时,经常介绍和引用他的观点。在学习和引用的过程中,笔者也产生过疑问,在这里提出来作进一步的讨论,向大家请教。

吴承明老师说:“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②我接触或参与论文答辩的一些经济史学博士生,确实有用当代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或者从中国古代一直研究到中国近代或当代。一般这类论文的选题比较窄,理论性不太强,如某类税收,某类市场,某项经济政策等。将古

[作者简介] 杜恂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邮箱:13918016639@163.com。

* 本文列入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的修改意见。

① 以上三文均收入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05页。

代与近代、当代串起来作研究,历史的系统性固然增强了,但笔者心中总有疑问:用当代理论研究古代社会是否科学?当代理论是否具有古今“通吃”的内涵?经济理论是否应该具有时代的特征?

随着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我心中的疑问逐渐从中国古代的理论适用性向中国近代的理论适用性延展。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将资本主义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资本主义、高度资本主义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他强调,资本主义的这些不同阶段需要区别对待,用不同的经济理论来加以分析。^①那就是说,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不是普适的,而应该是有针对性的、特定的,在一定范围和一定阶段才是合适的。

微观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理性经济人和完全信息,也就是完全竞争、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这几个基本假设虽然西方社会也难以完全达到,但正如萨缪尔森所说,这种差异对西方社会来说,只是“近似”的差异,而不是本质的差异。他说:“现在用完全竞争的模型近似地描述经济现实并不过分,没有必要为此而大惊小怪。”^②但近代中国的差异不是“近似”的,而是本质的。此处仅就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两条来加以简述。

首先,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都是建立在完全充分的私有产权制度前提之下。但是近代中国的私有产权是不充分不完整的,政治权力体现为最高产权,可以任意侵犯私有产权。^③

其次,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理论,即市场出清理论,坚信在价格可以自由而迅速升降时,市场一定会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资源可得以充分利用。完全竞争的四个条件是:市场上有大量买者和卖者;市场上每个厂商提供的商品都是同质的;所有的资源具有完全流动性;信息是完全的。也就是说,市场是统一的,是发育成熟的。但近代中国的市场既不统一,也远未发育成熟。近代中国市场的城乡分割、区域分割现象特别严重,要素流动成本很高,苛捐杂税的壁垒重重叠叠,行政干预横行,统一市场漫漫路远。西方主流经济学也认为西方社会很难达到完全竞争的状态,因此提出“不完全竞争”的概念。但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垄断”和“寡头”指的都是企业,而近代中国更多的是行政性控制或行政性垄断,非经济因素也由此演化为经济因素。在二元经济和割裂市场的条件下,生产要素的价格理论很难简单照搬到对近代中国的分析中去,农村剩余劳动力几乎可以无限供应城市工业的需要,但许多地区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常有在农忙季节回老家务农的习惯,为了正常开工,厂方不得不超额雇工。

最后,完全信息的假设更与近代中国的情况风马牛不相及。在按血缘、地缘、行业等划分的人群或集团内,是讲究信用的,是重视和相互传达有关信用的信息的,是有一套规则的,但这些规则并不普遍适用,这些信息也是有限传播。正如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员吴应图所说,“我国商家习惯,会计情形,素不肯轻示外人,而于业务情形,秘密尤甚”,对于会计师的查账“恐未必乐于推广,以自曝其公司之秘密”。^④上海的钱庄业者要想加入钱业公会,须把本钱庄的信息报告公会,以便公会决策;但事若涉及公会之外,信息的传递便十分困难。即使对政府的主管部门或相关职能部门,也采取封锁消息、阻断真实信息传递的立场。1930年7月2日,上海钱业公会执委会召开会议,否决了著名钱业领袖秦润卿要求钱业信息公开的改革建议。

西方微观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也在自我反思和寻求变革,以期更加接近实际生活。完全竞争、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的基本假设被一些学者突破,发展出了有限理性、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等新假设,建立并支撑这些新假设的理论基础,如可竞争市场理论、行为经济学理论、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① 杰弗里·M·霍奇逊著,高伟等译:《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② 萨缪尔森著,高鸿业译:《经济学》(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55—356页。

③ 杜恂诚、严国海、孙林:《中国近代国有经济思想、制度与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321页。

④ 吴应图:《提议请愿修改监察人制度案》(1925年3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S447-2-34。

论等。1991年因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R. H. Coase),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中还说,他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只是“在经济学的某分支或某一领域,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挑战主流经济学”,还没有能够对主流经济学形成“正面挑战”。^①2004年,美国阿兰·斯密德(A. A. Schmid)的中文版著作《制度与行为经济学》出版,这部书系统阐释了建立在“有限理性”基础上的行为经济学理论,其“内容简介”说,“作者以非凡的勇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众多观点提出了质疑”。^②可见有限理性和行为经济学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界并不是被普遍接受的。而该书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说,他和他的学生多次讨论过如何将行为经济学理论运用于“当今中国”的问题。^③尽管提出这些新理论的学者常常不认为他们自己属于主流经济学派,但随着这些理论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泛,他们中的一些杰出人士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属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学派的。相对于传统理论,他们的新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近当代中国经济史。诺斯认为,交易成本理论可以用来分析第三世界国家。^④寡头理论和垄断理论、博弈论等应该也可以运用于近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但即使是这些比较可用的理论,我们还是要注意各项假设条件,特别在运用公式推导时更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些相对传统的理论及分支就完全不可以用以分析近当代中国经济史,但这种应用应该是创造性应用,而不是照搬式应用。

在宏观经济学理论方面,罗斯托说,1945年以后出现了三种实际上相互独立的经济增长分析:新凯恩斯增长模型,这主要衍生自罗伊·哈罗德的工作;经济增长模式的统计分析,科林·克拉克是其中的先驱;对发展中国家的讨论与政策建议。^⑤这就是说,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增长的大部分理论分析,并不适合近当代中国。

关于经济周期,大致上有以下四种理论,每一种都以最早发现它的经济学家的名字命名:第一种:朱格拉周期。该周期的持续时间为9年左右,大致上与制造业的波动相关;第二种:基钦周期,3年左右,一般认为主要源于存货和银行信贷的波动;第三种:库兹涅茨周期,20年左右,一般认为与建筑业的波动紧密相关;第四种,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年左右,其关注的是价格的波动,包括工农产品贸易条件的变化,因此最受研究者的重视。^⑥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也有学者受以上经济周期理论的启发,探讨中国近代的经济周期问题。但根据罗斯托的说法,经济周期是一个经济体至少已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才会有。他的一个核心论断就是:“一旦经济开始起飞,经济周期就成为经济增长所呈现的形式。”^⑦

罗斯托1959年的研究认为,现代经济经过两个世纪的增长已经经历了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的准备阶段、起飞、趋于技术成熟阶段、大众化高消费阶段。1971年他还有保留地定义了一个追求品质的阶段。而起飞前的准备阶段对一个传统社会的转型至关重要,这个阶段的长短,依各国不同的国情而各不相同,日本大致只用了30年(1854—1885年),墨西哥则花费了大约120年(1820—1940年),而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算起,花费了大约110年(1842—1952年)。^⑧如此说来,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时期属于经济起飞前的准备阶段,因此无从使用以上四种经济周期理论来加以研究。但

① 罗纳德·H. 科斯:《新制度经济学》,克劳德·梅纳尔编,刘刚等译:《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② 阿兰·斯密德著,刘璨、吴水荣译:《制度与行为经济学》“勒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 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中文版序言Ⅲ”。

④ 道格拉斯·C. 诺斯:《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克劳德·梅纳尔编:《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第50页。

⑤ W. W. 罗斯托著,陈春良等译:《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⑥ 阿瑟·刘易斯著,梁小民译:《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23页。

⑦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656—657、720页。

⑧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659—660、724页。

这并不是说,近代中国没有经济周期,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应该与经济起飞后的周期有区别,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有区别。如果近代中国有周期,那么引起周期的原因是什么,其制约因素和表现形式与西方国家有些什么不同,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笔者曾经指出:政治因素在中国近代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称其为“政治性周期”,就是指由政治因素所引起的经济制度、产权结构、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周期性变化。^①这种见解是否能够成立,希望学界批评赐教。

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引起经济周期的原因,也有内因和外因两种意见之别。在内因论方面,熊彼特和库兹涅茨的创新理论是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他们都把创新看作经济增长的关键维度;都认为创新过程的内在不均衡恰是理解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的关键;都承认要获得这些洞见不仅要进行总体层面的分析,而且要对实际上发生创新的部门展开详细分析;都认为在激烈的创新变化中被赶超的部门不可避免地会走上减速路径,并以此展开自己的分析”。^②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所谓“新组合”,即“以新的方式将这些物质和自然力量组合起来”,这种新组合不是均匀出现的,而是“间断出现的”。^③这类新组合不仅包括技术进步,而且包括组织创新、市场开拓等总共五个方面。^④

但是,熊彼特说,他假设其分析的是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并不包括发展中国家。他说:“我们主要考虑一个商业为本的国家,私有产权、劳动分工和自由竞争乃是其基本国策。”^⑤他主要研究的国家是德国、英国和美国。熊彼特的理论不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拿来就用。近代中国也发生过各种“新组合”的创新,但制度条件、背景条件、社会条件、文化条件等各种约束条件跟发达国家相比会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要把这些差异找出来。在西方主要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有三大创新,即纺织机和工厂、蒸汽机、焦炭冶炼法,第二次工业革命以铁路为中心,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以汽车、电力、轻轨和电话为中心。^⑥按照熊彼特和库兹涅茨的观点,这类重大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构成了经济周期的内在原因。而在近代中国,这些重要产业中的一部分移植自西方国家,是一种仿效,仿效的顺序也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按照一、二、三次工业革命的顺序进行的,纺织、铁路、电力、轻轨、电话等行业几乎很难用明显的规律性的阶段来划分,而且多数行业由西方资本掌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运行的规律也应该跟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在外因论方面,凯恩斯主义和计量经济学派由于很难把创新作为变量列入他们的经济学模型,只能以“随机冲击”的外生解释来代替创新的内生力量,实际上是对创新引发内生周期理论的巨大退步。^⑦

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提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认为政府应增加支出,更多地干预经济,这样才可以提高就业水平。凯恩斯主义,以及新凯恩斯主义,是西方经济学中的重要流派。每当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许多人就会将其奉为圭臬,而经济繁荣的年代,或经济滞胀的年代,凯恩斯主义又会遭到冷落和批评。托宾在1996年曾说:“正如30年代的大萧条为凯恩斯革命提供了有利的环境,70年代的‘大滞胀’引导经济学家和公众迎接反凯恩斯革命的到来。”^⑧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2008年发生世界经济不景气,又促使凯恩斯主义抬头。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发生后,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反对政府扩大对经济

① 参阅杜恂诚《中国近代经济的政治性周期与逆向运作》,《史林》2001年第11期。

②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369页。

③ 约瑟夫·熊彼特著,郭武军、吕阳译:《经济发展理论》,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④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56—57页。

⑤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3页。

⑥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50页、第302页注2。

⑦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457—462页。

⑧ 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著,王曙光、来有为等译:《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的干预和政府过度提供的社会福利上。由于福利的刚性,二战后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开支增长迅速,造成财政赤字不断加重,且是政府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在1980—2011年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社会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都在不同程度地上升,超过40%成为常态,很多国家超过50%。^①有学者根据比GDP含义更广泛的一种新定义GDO(Gross Domestic Output)的统计,消费品仅占经济活动的1/3左右,而工商业支出(投资加上中间商品支出)占整个经济的一半还多。因此,在美国及多数其他国家,工商业投资比消费者支出重要得多。^②另外,对于凯恩斯主义者根据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所发明的新工具,即总供给和总需求理论(AS-AD理论),一些著名学者作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③

但不管怎么说,一旦经济形势不好,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就会大大提升。我国的经济学界,也比较接受凯恩斯理论。但凯恩斯理论所要达到的目标,无论跟中国近代国民政府时期的统制经济,还是跟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差别都非常大。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目标是微调并拯救资本主义制度。^④凯恩斯主张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的设想是一种改良了的资本主义,是管理的资本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自身缺陷之中被挽救出来的资本主义。但他主张大部分决策仍应留给分散的市场而不是中央计划者。^⑤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说:“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凯恩斯的理论为管理和福利导向的资本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⑥托宾总结凯恩斯主义的9个核心观点,都是针对“现代工业经济国家”的,^⑦并不是针对像近代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的,也不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凯恩斯在发表于《优生学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他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他认为:“资本需求是三个变量的函数:人口增长率、‘生活标准’变化率、技术特性和进步速度。”^⑧显然,把人口增长率纳入资本需求三变量之一,应该就不是针对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的,中国的农村人口几乎可以“无限”供应城市产业的发展。生活标准变化率也完全不适合近代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尚未摆脱温饱之忧的状况。

凯恩斯自己强调:“故除了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必须由中央统制,以便二者互相配合适应以外,实在没有理由要使经济生活比以前更社会化。”^⑨他的主张跟南京国民政府在几乎所有经济领域实施的行政性垄断都是不同的,跟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则更不相同。^⑩所以,对于凯恩斯主义理论,不能简单拿来应用于近代和当代中国。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重视分析非市场因素,重视不同的历史和人文背景。这一学派的理论是可以横跨微观和宏观两个领域的。就宏观而言,新制度经济学是一种补充,它引入了交易成本理论和边际分析工具,研究范围广泛,研究对象少有限制,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虽不占主导地位,但比较适合作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工具。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理论,无论微观,还是宏观,其基本的假设条件都是针对西方经济体的演绎结晶。微观理论中的一些新流派,放松了这些基本假设条件,使其与实际生活更为贴近。新制度

① 刘世强、王翔宇:《大众民主、政府扩张与国际体系变迁》,《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② 马克·斯考森著,马春文等译:《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第379页。

③ 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第249页。

④ 保罗·克鲁格曼著,朱文晖、王玉清译:《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⑤ 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著,段宏等译:《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⑥ 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第51页。

⑦ 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第29—30页。

⑧ 凯恩斯:《人口下降的一些经济学推论》(“Som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 Declining Population”, *The Eugenics Review*, Vol. 29-1, April 1937, pp. 13-17),转引自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297页。

⑨ 凯恩斯著,徐毓钊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21—322页。

⑩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324页。

经济学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但是,就总体而言,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能成为近当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具的。即使是把“三不”新理论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也必须注明假设条件的论证。新理论主要是一种方法论的启示,至于落实到具体问题,如果是运用公式,须对参数进行校正。比如,近代中国的不完全市场,并不单纯是寡占和经济组织的垄断,还存在严重的区域行政性垄断及由此造成的排外性交易成本和进入障碍;此外,传统经济组织的制度陋习也造成交易成本的上升。这是不同于西方成熟社会的。

二、主流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局限

西方经济学早已成为“显学”,且有日益向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渗透的迹象,被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确实,西方经济学有一套严密的逻辑和体系。经济学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和工具。戴维·科兰德认为:“在宏观经济学中,我们没有确定的理论,而只有一种普遍的理解方式。一种普遍理解方式的假设的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假设是这种理解方式的一部分。在我们所能理解的东西中,假设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①保罗·克鲁格曼说:“应该说,无论从任何意义讲,经济分析都不是一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而应该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可以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的工具。”^②1992年获诺贝尔奖的加里·贝克尔认为:“我们把经济分析视为一种理解人类行为的有效方式,它不仅为经济本身,也为社会的组织形式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我认为在大多数地方,经济学被当成策略来教授;我不知道其他学校的教师是否认为经济学是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但芝加哥的教授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③

既然西方经济学是如此重要的理解世界的方法和工具,那为什么笔者还说,不能随便拿来运用于分析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呢?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对象是西方社会,其假设条件与西方社会相符,而与近当代中国是不符合,或不太符合的。近当代中国的历史特征、制度条件和各种社会约束条件没有能够在西方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中反映出来。

主流经济学是从四个途径规避或忽略经济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的:第一,对普遍存在的共同特征或疑问的认同,集中于共性,而忽略区别;第二,假定一个系统是“自然的”,而所有其他系统是“非自然的”。一旦任何既定的社会-经济系统被认为是“自然的”,那么所有的偏离都会被当做需要纠正的背离。这一教条中的问题就是将“自然”视为想当然的;第三,将经济学视为人类本质或心理的表现,为了坚持这样一种关于契约和交易的“自然的”观点,它们必须被看作与特定的、历史创造的制度(如财产、法律等)相区别的东西;第四,认为自由市场是理想的,不完美市场或消失的市场等情况被忽略。^④

主流经济学家规避历史特性,是为了追求所谓“一般的理论”。既然是“一般的理论”,那似乎就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就应该是一把解释世界的“万能钥匙”。有研究者指出:“由于一般性理论被爆炸性的复杂性所压倒,所以在一般性理论方面做出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必须放弃许多一般性。他们进行简化,声称‘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来总结这一模型”;“总之,致力于一般性的、研究复杂现象的理论,通常都被证明其范围非常狭窄”;“他们宣称的目的是,证明只有在严格的限制性条件下真实市场才会运作得最好。然而,一般均衡理论的这种‘合法化’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它只是许多可能的、描述真实市场机制的理论努力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一般均衡理论是唯一可能的

① 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第243页。

② 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第230页。

③ 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第206页。

④ 杰弗里·M.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第33—37页。

理论。”^①

事实上,经济学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夹杂着千差万别的人类主观感受、文化、制度等因素在内,是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一般,形成种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的。其实,自然科学的“一般性”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也是受特定时空等条件所制约的。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科学界100年来从未停止过争论。社会科学界十分仰仗的达尔文进化论,事实上并非缤纷多姿的自然界形成原因的唯一解释,一个时期以来,恐怕“大爆炸”理论是对于宇宙万物的形成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即使是达尔文理论,其本身也在发生改变:自然选择引起的仅仅是适应性改变,而非适应性改变则由生物的基因等所决定。主流经济学本身为适应不同时期的进化也说明“一般理论”的相对性。甚至在同一时期,经济学理论界内部也意见分歧,学说众多,相映成辉。

就像唐纳德·麦克洛斯基所说的那样,许多现代经济学流派都包含“以多维假设为条件的研究”。一步一步地,许多经济学理论正在脱离现实世界。经济学已经越来越陷于对数学技术的钻研,而不是着眼于研究真实的制度结构和机制。^② 约翰·威廉姆森说:“依我看,古典理论出于推理目的而假设为固定量的那些东西,应该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③ 经济学将自己确定为普遍的社会物理学的目标,诱使经济学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沼之中。索洛说:“把经济学建立成以公理为基础的硬科学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④ 他还说:“有些经济学家试图建立一种规范的模型,他们可以运用这个模型来回答他们感兴趣的任何问题。”而他则认为“宏观经济学就应是各种模型的集合,其中的每一个模型都专注于模型发生作用的一种或两种宏观经济机制”。^⑤ 索洛认识到经济学应该把抽象掉的历史特征重新恢复过来。^⑥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政府的经济作用”一章中用灯塔作为私人企业不能提供的完全公共物品的例子。但罗纳德·科斯却发现,在19世纪以前,英国的许多灯塔都为个人或私人企业所拥有。他们通过对停泊在附近港口的船只收取可观的通行费而获利。科斯发现,除了萨缪尔森之外,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穆勒、西奇威克、庇古等人都明显忽视了他们本国历史上的私人灯塔。科斯总结道:“灯塔,就这么被凭空抓来作为例子了。”^⑦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评论“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是“将人视做计算快乐与痛苦的闪电般的计算器”,认为这与生活实践是相背的。^⑧ 罗斯托指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中心命题假定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而持不同意见者则强调垄断和严重的周期性失业。正式理论将收入分配与个体的经济功能即净边际产品价值联系在一起,而持不同意见者(如穆勒)则关注制度、土地所有权的模式、遗产继承法、教育的相对可及性,关注历史上特定社会中出现的其他决定收入分配的非经济因素。”^⑨

在经济学家中,马歇尔、凯恩斯等是反对滥用数学的。精通数学的马歇尔意识到,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虽然有益,但同样存在危险和局限。马歇尔认为,数学真正合理的适用范围极为有限。他的《经济学原理》开篇第一句就是:“经济条件是不不断变化的,每个时代都以它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它自己

① 杰弗里·M.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第18—19页。

② 杰弗里·M.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第280页。

③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351页。

④ 杰弗里·M.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第305页。

⑤ 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第328页。

⑥ 杰弗里·M.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第306页。

⑦ 杰弗里·M.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第374页。

⑧ 杰弗里·M.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第166页。

⑨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232—234页。

的问题。”马歇尔从最初的数学转向形而上学,继而伦理学,最后归于政治经济学。^① 尽管数理经济学家利用凯恩斯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学科,但凯恩斯本人则和马歇尔一样,强烈批评在经济学研究中滥用数学和形式化方法,认为“将一个模型转化成一个数量化的公式就严重破坏了其作为思维工具的有用性”。^② 数量化的公式处理会把许多代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真知灼见抛在一边。萨缪尔森曾说:“作为一个理论家,就像毕加索一样,没有哪个下午我想不出一个新玩意。然而,在研究真实世界的市场时,为了作些有意义的贡献,我们必须年复一年地收集数据并对其展开分析。”^③ 纯数学推导可以让人一个下午至少想出一个“新玩意”,这与成年累月地致力于“真实世界”的研究,投入产出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饱受“李嘉图恶习”之苦。何为“李嘉图恶习”?萨缪尔森称之为“抽象的方法论”,科斯名之曰“黑板经济学”。简单地说,李嘉图恶习就是理论和历史的长时期分离。它剥离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纯粹的演绎推理加上数学公式,完全无视历史、社会学、哲学和制度框架。它是在不现实的、甚至是错误的假定下进行抽象的思考,建立抽象的模型。1996年1月,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经济学已不再研究实际问题了,它已日益成为数学的一个神秘分支。^④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罗波特·墨菲说,他的著作“不会像其他经济学教科书一样,进行‘效用函数’的微积分演算。虽然这种做法很普遍,但却很危险。因为它误导你认为能够测量人从行动中得到的心理满足”。^⑤

罗斯托认为,主流增长模型“曾用各种方法讨论发明、创新和技术的作用”,而所有这些方法的使用,“都是为了回避熊彼特的核心洞见”,也就是“大量的创新是大规模、内生、非连续的创新”,由特定部门逐渐延伸至相关部门,影响到总体经济结构和经济中所有重要的变量,如产出增长率、信贷需求、价格水平、实际工资、利润率等。而主流经济学的这些方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假定:第一,假定没有技术进步;第二,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渐进的;第三,假定技术进步体现在投资中,是投资率的函数;第四,假定所有技术变迁都是内生的,但是渐进的,源于要素价格、生产中累积的经验、教育,以及其他人力资本和研发投资的改进。只要假设技术进步是渐进的,就可以在增长模型中假定其为中性的而变得容易处理。^⑥ 同时,罗斯托认为传统经济理论存在四方面缺陷:第一,传统理论没有提供把非经济因素系统地引入经济增长分析的路径;第二,传统的框架中无法容纳新生产函数产生和扩散的过程;第三,主流理论没能对比传统经济周期还要长的基本商品和制成品相对价格的趋势周期提供可信的解释;第四,它无法令人信服地阐释常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过程之间的联系。^⑦

以上整理出一些经济学家对主流经济理论局限性的总结或评论,绝不是为了证明经济学理论是不重要的,或缺乏智慧的。恰恰相反,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积累和沉淀了大量人类的智慧。强调其局限性,只是为了说明,我们在运用这些理论之前,先要了解其分析的对象和各种假设条件,而不能直接、轻易地拿来就用,至少在宏观层面,能够直接拿来就套用的理论是没有的。如果并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而生搬硬套,必然走向我们良好主观愿望的反面。如果有可能,首先要对理论进行一番创造性的转化。即使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由于中西社会的制度、历史、人文、法律背景的不同,也要充分注意由于约束条件不同而引起的理论和逻辑框架的调整。

那么,我们从发展经济学中是否能够找到直接用于分析近当代中国的工具呢?回答恐怕也会令

①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246页。

② 杰弗里·M.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第257页。

③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457页。

④ 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第221页。

⑤ 罗波特·墨菲著,程晔译:《第一本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⑥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514—51页。

⑦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655页。

人失望。1939年以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很少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些真正参与到发展中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中的经济学家们都太忙了,以至于都来不及[对]自己所经历操作的事情展开系统性分析,并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总结提炼”。^①而二战结束后,虽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关注发展中国家问题,并形成发展经济学派,但这类研究多为整体性的共性研究,针对中国的理论分析甚少。中国近代被罗斯托归于起飞前的漫长的准备阶段,一带而过,而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经济,似乎仅以观望和描述为主,很少从理论上加以总结。

钱纳里等人研究1945年以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区别的结构转变特征、恩格尔系数、劳动力弹性供给等不同阶段的比较优势、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人口变动特征等。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批量的、一篮子研究,侧重各种统计数据。^②

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论述是在继承伯克、希金斯等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形成的,后来又由其他人补充和发展,影响较大。刘易斯将二元结构分析与工业化产生和发展的条件相联系,并认为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隐蔽失业或过剩劳动力,使现代城市工业部门能以不变的低工资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成为可能。虽然刘易斯等人关于二元结构的理论确实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一种经济状况,但这一理论过于粗疏,未作深入探寻,且只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这一单一要素,而没有研究资金、技术等其他要素的转移或流向,以及国民经济结构的全面转换问题。此外,刘易斯关于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设和“不变工资条件”的假设都与现实不符,刘易斯的“最低生存费收入”和拉尼斯等人的“制度性固定工资”也都是些实际上不可测定的概念。^③

刘易斯对中国不熟悉,他的直接经验主要来自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和印度。他也是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一般问题或共性问题,研究总的发展趋势,而缺乏个性特征。刘易斯在《增长与波动》中把世界分为“核心国”和“外围国”。“核心国”,即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书中所称的“增长的发动机”是指整个核心国的工业部分。除了四个核心国外,其他国家都是“外围国”。刘易斯对核心国的作用作了充分的、甚至可以说是过分的肯定,认为它们在三个方面对外围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即:提供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贡献了资源,特别是资本和人力;贡献了它们自己的市场。而核心国似乎并不需要外围国帮助。但这种说法与他自己后面的论述自相矛盾。他后面说到,1880年后,英国在一轮创新的后期,铁路等新技术的国内投资已经普及,投资人更愿意向国外投资,而不是更新国内投资,因为“在一个新国家采用新体系比在一个已有铁路系统的旧国家采用新体系要廉价得多。这是英国人常说的最先开始发展的不利性之一,特别是在他们的铁路、矿山、炼铁炉和道路的投资方面这个问题更突出。新国家的有利之处就在于还没有开始,在采用新体系之前也不用拆除旧体系的结构”。^④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对落后国家政府的作用几乎作了全盘否定。他说:“如果采取公有制或中央计划是把全部经济事务的责任交给现在的政府,那么,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中,经济增长肯定是不可能的。在政府腐败而低效率的国家中,自由放任,自由通行是经济增长的最好方法。只有在建立了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时,私营企业和公有制的相对优点或控制的优点才会成为重要的争论。”^⑤他认为,落后国家政府的相机抉择控制是最具破坏力的。^⑥

在这个问题上,罗斯托的观点跟刘易斯是接近的。他说,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公共干预的力量已

①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479—480页。

② H. 钱纳里, S. 鲁宾逊, M. 赛尔奎因著, 吴奇、王松宝等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版,第19—20, 34—40页。

③ 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198页。

④ 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第4, 24—26, 160页。

⑤ 阿瑟·刘易斯著,梁小民译:《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00页。

⑥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第481页。

经过度,应在更大程度上依赖私有企业和竞争市场的规律。我相信,导致新古典主义者攻击结构主义者的主要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对经济施加公共干预的范围和结果”。^①

但《制高点》的作者却持相反看法,他们认为,“发展经济学家怀疑市场及其活力。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部门充满怀疑”;“在发展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政府应当发挥比从前大得多的核心作用。纠正市场不完善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强有力的国家”。^② 克鲁格曼分析“亚洲体制”时认为:“在这一制度里,国家大体上被用作一个经济发展的工具。”^③

综上所述,发展经济学理论有三个局限:一是以研究共性为主,对个别国家的深入研究很少;二是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而对当代中国也是以观望为主;三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非经济因素分析时,虽然突出了政府的作用,但两种观点南辕北辙,是很对立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近代当代中国经济问题时,也不可能把发展经济学简单地拿过来就用,而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和突破才行。

三、中国的经济史学的一般目标

就中国的经济史学界而言,经济史学的目标应包括一般目标和最高目标两种。中国的经济史学的一般目标是对应用于中国的经济学一般理论进行限制、校正和还原。

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的历史经济学家L. L. 普赖斯对于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关系有很精到的总结。他认为,“经济史不应该是推测性的,因为它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艰苦的归纳性研究”,他重申,“归纳性研究和经济史本质上对经济理论起到限制和校正的作用”;他断定,“历史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特定的经济理论只适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另一方面,他认为“没有易于理解的理论,就不可能有经济史”,经济理论应对经济史研究起指导作用。^④ 这就是说,经济史对经济理论起限制和校正作用,而经济理论则对经济史起指导作用。这就是二者应有的一般关系。

英国历史经济学家阿什利认为:“经济史对理解社会演化方向、区分各个生产阶段,以及提醒人们注意经济理论的相对性和假设本质来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⑤他特别重视制度研究,“力图揭示制度的意义,其成长与衰退的历程,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比分析归纳出一般结论”。^⑥ 经济学在追求一般性理论的过程中,把各种历史特征、社会背景、文化现象、制度特征等抽象掉了,经济史研究就是要把抽象掉的东西有规律地还原出来,能够反映本质地还原出来,与经济理论相映成辉,使人们能够认识到,经济理论虽然是“一般的”,但仍然具有特定的涵义,是针对特定社会和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是相对的、动态发展的,有着明确的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而不是永恒的、抽象的、教条的、静止的和绝对的。而经济史研究要能得到规律性、本质性的研究成果,需有经济理论的指导和“一般性”结论的启示,否则可能盲人摸象,不得要领。

经济史和一般性的经济理论都是针对特定社会和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进行研究的,只是前者主要用归纳的方法(不排除一定程度上应用演绎方法),后者主要用演绎方法,包括数学;前者关注个性和特殊性,特别是各类非经济因素,后者相对更关注共性和一般性,通过假设等途径把非经济因素抽象掉或固定化。两类研究得出的成果相互补充,相互限制,相互校正,相互引领,才能相得益彰。

①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648—649页。

② 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第106—107页。

③ 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第51页。

④ 杰拉德·M. 库特著,乔吉燕译:《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107页。

⑤ 杰拉德·M. 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第131页。

⑥ 杰拉德·M. 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第125页。

对于致力于构建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的学者而言,他们可以从经济史学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历史特征和非经济因素在不同时段经济增长过程中展现的规律,融入其经济学理论中去,而不是用中国的历史数据来证明某个西方经济学模型的正确性和普遍适用性,不是模仿西方学者发表过的某篇论文的样式来一次拷贝不走样的“中国版”。有学者对于不符合西方模型需要的经济史学研究成果,采取无视和排斥的态度,认为不符合经济学规范的要求。岂知如何把各种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学规范,正是对于有创造性能力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者的核心要求,是对其专业能力的检验。把各种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学规范,本身就是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界和经济史学界最重要、最关键的创新任务,虽然无法一步就达到理想境界,但可以多做尝试。首先要放弃“中国版”的心态才行,这个道理对于杂志社的编辑也是适用的。

放下“中国版”的心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史学界这么多年来还是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并不是说,只有在西方学者引领下中国学者的研究才能与国际接轨,才能走上正途。笔者以为,中国学者只要对于近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历史特征和非经济因素,以特定的视角掌握第一手资料,总结出规律,就是原创性成果。而原创性成果就是学术前沿。除此之外不存在抽象的学术前沿,不存在简单地与国外接轨就是学术前沿之说。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的学者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不会像马克思·韦伯那样不识汉字和不谙中国历史,那么,中国的学者为什么不能主导中国史和中国经济的研究呢?

上文说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基本上都不是直接针对近代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的,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把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列入经济起飞前的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才会出现的一些规律也不适合于分析近代中国。所以,研究近代中国,应慎用经济学理论和概念,须作出调整,有明确的定义、假设和适用范围。而对于古代中国,则基本上不适宜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去进行分析,因为已不具有适用性。有的经济学概念,如分工、市场等,虽然中国古代也有分工、市场等经济形态,但其内涵及背景条件与近当代大相径庭,应作出具体的分析,不能与近当代的情况作简单类比。

市场是制度化的交换,古代市场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必然有很大不同,包括内涵、规模、特征、规则等都不相同,因此不能简单地市场规模这一点上作古今比较,或中外比较,并由此得出诸多结论。“理论界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用同样的词汇涵盖所有历史现象。”^①英国历史经济学家威廉·詹姆斯·阿什利是将经济史创建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反对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去理解中世纪经济历史。他指出,中世纪经济中没有现代经济理论所理解的竞争,没有生产成本、利润或劳动力的流动性。^②在古代社会,市场、竞争等只以初级形态存在。我们不能很草率地拿现在的市场理论去类比古代市场,套用于古代市场。

有的外国著名学者,不知从哪儿弄出一套中国古代的GDP数据,引起学界哗然。虽然引用者众多,但笔者以为不足为训。其理由一是数据出处不明,该学者对此不作任何说明,没有表现出哪怕最小程度的对历史数据的“敬畏”之心和透明真实的治学之道;理由之二,更重要的是,GDP本质上是一种凯恩斯主义统计方法,是针对工业社会而言的。古代社会的C+I+G中的投资项和政府支出项该如何定义?如何测算?完全从产出来算,并不科学,而且农民生产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比重进入市场,在古代也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支撑。对于古代社会,完全可以通过计算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总产量、人均产量、亩产量等方式来考察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在不适用的时期引入GDP概念,自以为“科学”和“前沿”,实际上完全不能说明问题。

库兹涅茨通过统计,发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些规律,其中包括三大产业(工业、农业、服务

① 杰弗里·M.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第312页。

② 杰拉德·M. 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第125页。

业)结构变化的规律,即:农业部门对产出以及劳动力吸收的相对贡献在下降;工业部门的贡献在上升;服务业部门的贡献并非始终如一,在某些最富裕的国家中,该部门的产出份额明显上升。不过,由于服务业部门的平均生产力要低于工业部门,这使得处于较高人均资本产出水平上的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显著上升。^①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是特指各国的经济起飞阶段。^②一部欧洲经济史对1870—1914年欧洲服务业的统计包括四个主要项目,即铁路、航运、电报和电话。此外,还有银行业。^③有的学者拿三大产业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经济,显然是不得要领的。即使拿来研究中国近代,也似不甚妥帖。因为按照罗斯托的说法,中国近代经济尚处于起飞前的准备阶段。三大产业的划分是在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城市化蓬勃发展后提出的。在古代,没有发达的金融业、社会化和专业化的服务业、大型商业旅馆业等,制造业只是手工业,与农业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三大产业的划分是没有意义的,完全不能反映出生产方式变革、制度变革和城市化变革。

对于宋、明、清等朝代粮食等市场的运营机制、空间布局、市场规模和市场整合等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经济史学界颇为流行,这当然很有价值。但古代市场与近当代市场的涵义是不同的。古代市场只以初级形式存在,以往的学者仅以长距离贩运量来大致衡量中国古代市场的规模。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中后期租佃制度和赋税制度的特殊性,农民要用货币交租,田主要用货币交税,特别是明代实行“一条鞭法”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市场规模相对比同时期实行庄园制经济的西方国家更大,在初级水平的分工也更显著些,但这并不说明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有人研究中国古代粮食市场的整合,其结论可能引起一定的争议,但即使能够充分证明中国古代某时段的粮食市场曾经是整合的,那也只是古代初级市场的一种阶段性的整合,是一种初级市场的内部完善,而一旦市场发展到中高级阶段,生产方式发生改变,社会开始转型,市场又有可能从整合转向分割,然后又在新的基础和新的条件下,重新开始漫长的整合过程。

中国古代市场与近代市场是有明显区别的,表现为发展阶段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生产方式的不同。近代出现了新兴的工厂机器大工业,而且集中于一些大城市中,产品的交易市场不再以地域的远近作为区分的标志,城市本身成为最大的市场。其二是制度背景的不同。在古代,适宜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各种先进制度阙如,例如现代的契约制度、产权制度、法律体系等,而只是在皇权之下的一种互通有无。其三是流通格局的不同。古代市场基本上只是在国内流通,而近代新式市场则成为世界经济大流通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近代,传统市场凡未纳入对外贸易流通格局的,大致上都呈衰落趋势,如盐市场、粮食市场等,而新兴市场则发展很快。但从市场特征看,近代中国的各类市场跨区域的交易成本很高,甚至高过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其中既有行政性壁垒的因素,又有区域间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资源分布不平衡所带来的价格差异因素。这种市场分割的态势,即使在当代,也没有完全被打破。

经济史对经济学一般理论的限制,还表现为历史数据的获得应通过历史资料(特别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的收集取得,而不是通过计量模型或经济学模型取得。数据不能通过计量模型演绎取得,不能让人工得到的数据先验地取得其内在的规律性。历史数据只能从文献中收集。历史数据的收集、甄别、整理,本身就是一项经济史的基础研究,特别是对于一个还没有出现统计机构,各种数据口径不一、不完整、不系统的年代尤为如此。这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功。计量模型只宜用来验证数据之间的关系。

总之,西方的各派经济学理论基本上都不能直接、简单地应用于近当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之

①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543页。

②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543页。

③ 斯蒂芬·布劳德伯利、凯文·H. 奥洛克编著,张敏、孔尚会译:《剑桥现代欧洲经济史:1870年至今》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5—67页。

中,当我们希望借鉴某种理论时,必须进行适用性论证,必须根据近当代中国的国情,对原理论进行创造性重塑,特别是对于各种假设条件,必须以中国的国情进行限制、校正或增删。这就是经济史学科存在的意义所在。西方经济理论运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时,其研究范式必须对假设条件进行论证,通过中国经济史的历史“还原”,把假设条件变成真实的历史约束条件,研究在真实条件的约束下,原先的经济学理论所阐释的规律会发生哪些改变;如果这种改变是原来的理论所不能涵盖的,则归纳和演绎出新的规律或理论。当然,理论反过来应指导经济史研究,这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四、中国的经济史学的最高目标

中国的经济史学的最高目标是开创适合近代和当代中国国情的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学派。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流派的代表性人物,都是非常重视经济史研究的,他们的代表作,不少就是经济史著作。在这里,经济史研究与经济理论的阐释实现了交融,史中有理论,理论中有史,达到了至高的学术境界。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一部理论与历史有机交融的佳作。在该书的前四篇中,斯密通过“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总结各专题史实中获得理论,“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而第五篇关于君王或国家的收入,则通过对“几乎所有近代各国政府”赋税和举债的史实来分析其对经济的影响。^① 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方法论的特征上与斯密的《国富论》有相类似之处,即围绕主题的论证,以形而上的演绎的逻辑层层展开和构建分析的框架,但在许多章节或专题的论述中,大量总结历史的经验事实证据,把理论和历史有机地融合起来。

上文说过,在西方经济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马歇尔重视经济史,也研究经济史。熊彼特和库兹涅茨都是“能够把历史分析、统计分析与理论结合起来”的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掌握历史资料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所有经济学家中,只有休谟、斯密和马歇尔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与之相提并论)”。^② 熊彼特关于经济增长创新理论的提出,是建筑在他对三个重大创新相对集中的历史时期的经济史进行总结归纳的基础之上的,这三个重大创新相对集中的时期是:棉纺织、焦炭炼铁以及始于18世纪80年代的瓦特蒸汽机;始于19世纪30和40年代的铁路以及始于19世纪60年代末的钢铁;世纪之交的电力、新兴化工和内燃机。熊彼特为了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这三重周期综合在一起,在《经济周期》一书中用了250页篇幅进行历史详述,对18世纪80年代至1914年间的价格、产出增长率、失业水平、主要行业的价格表现、工资、资本供给以及利率等实际上发生的变化展开了实证研究,尽管对最终的结果仍不满意。据说,他晚年曾因为自己不是一位经济史学家而感到遗憾。^③ 实际上,熊彼特既是经济理论家,也算得上是杰出的经济史学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周期》等著作既是其创新理论的代表作,也同样被认为是商业史的奠基之作;他遗憾自己不是一位经济史学家,只是因为他没能在融合三种周期理论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罢了。熊彼特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良好训练的根本所在。熊彼特使用的“经济史”概念不仅包括过去,而且包括目前的事实。这不仅仅要求理论家们必须精通事实,从而引导他们把学好经济史放在首位。为了充分地使经济运行理论化,熊彼特坚持说,人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学主题从本质上看无非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间过程”。^④ 至于库兹涅茨,他来自“偏好事实胜于理论”的知识传统,他与他的老师韦斯利·

① 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页。

②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369、367页。

③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364—368页。

④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斯和经济理论》,约翰·N. 德勒巴克、约翰·V. C. 奈编,张宇燕等译:《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第2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米切尔一样,深受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库兹涅茨从经验数据出发,研究各个国家的产业发展规律,探寻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各领风骚三十年?为什么旧产业的增长会减速?为什么一个国家发明与组织能力均匀地流入经济活动的各个渠道,而各个生产部门的进步却并不同步?是什么使得这种力量的汇聚由一个领域转向另外一个领域?库兹涅茨把“经济史学家们所讨论的相关因素”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得出与熊彼特相同的结论,即“技术变化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①

继承马歇尔传统的英国剑桥经济学家丹尼斯·罗伯逊研究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广泛存在的投资孕育期对周期性波动的可能影响。他认为,“经济周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投资决策,而这种决策反过来又受当前市场盈利状况的影响”;“经济周期还受资本品使用期限的影响,这里典型的例子是船舶”。哈奇逊评价罗伯逊的《产业波动研究》一书时说:“此书是这个方面第一本由英国的经济学家整合历史、统计和理论分析写成的专著。”罗斯托认为,就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联系而言,罗伯逊的研究是1870—1937年间为数不多的最具原创性的工作之一。^②

货币数量论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与安娜·J.施瓦茨合作撰写的《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一书中说:“我们要引用德·摩根十分精辟的话作为本书的座右铭:每一项经验研究都要依靠某种理论框架,依靠一整套用证据加以验证或推翻的推测性假说。”^③那就是说,他们的研究是把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学理论研究融合为一体的。这当然是经济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弗里德曼的代表性著作之一《美国货币史(1867—1960)》也是与施瓦茨合作的,他自己说,这本书“读起来可能有点像一般的经济史”,但实际上并不只是一般的经济史,“本书所涉及的内容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自始至终,我们都在跟踪一条线索,那就是货币存量”,研究“美国历史上大多数主要事件对货币存量的影响”,阐述了货币数量理论的主要观点。^④他们批评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大萧条开始时期的作为,认为该机构在本应扩大信用的时候紧缩信用,以致造成局面的不可收拾。^⑤

货币数量论的提出是对凯恩斯关于大萧条的发生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的否定,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确立了独树一帜且影响深远的地位。我们也可从中看到,经济史一旦与经济理论融合所能发挥的威力。

道格拉斯·诺思既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史学家。他对经济史学的研究造就了他的新制度经济学成就。福格尔说,“像诺思那样有效地利用历史的理论家寥若晨星”,“与熊彼特、库兹涅茨和舒尔茨一样,诺思一直主要是从历史而不是数学模型中获取给养来发展其理论的”,“自从他和兰斯·戴维斯1971年出版了《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以来,诺思便主要作为一位经济理论家从事研究,他那广博精深的历史和经济学知识使他成为了‘新制度经济学’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之一”。^⑥

诺思的研究方法虽然与熊彼特相似,但结论却大相径庭。诺思认为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不是技术变革,而是制度变革。他和罗伯斯·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⑦

①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369—371页。

②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第404—405页。

③ 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著,范国鹰等译:《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④ 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著,巴曙松等译:《美国货币史(1867—196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⑤ 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867—1960)》,第493—496页。

⑥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思和经济理论》,约翰·N.德勒巴克、约翰·V.C.奈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第2辑,第27、28—29页。

⑦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诺斯和巴里·温格斯特斯的论文《宪法与承诺:17世纪英国公共选择制度的演进》“揭示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对导致安全的产权制度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制度变迁不仅包括对王权单方面剥夺所有权的限制,而且还包括建立足够强大的独立司法体系以限制国会的恣意妄为和政府对工商业者违约能力”。他们“还考察了随这些制度变迁而来的财政革命以及对私人资本市场的促进,其中包括银行的兴起和日趋多样化的金融工具”。^①

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说:“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结在了一起。现在和未来的选择是由过去所形塑的,并且只有在制度演化的历史话语中,才能理解过去。将制度整合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分析中去,是改进二者最重要的步骤之一。”^②他的名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分3篇:第1篇理论,第2篇历史,第3篇理论与历史,整个论述结构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历史的紧密结合。

罗斯托既是发展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史学家。他的发展经济学说也是建立在理论和历史相融合的基础之上。他指出,“归根结蒂,经济成长阶段既是一种关于经济成长的学说,又是一种关于整个现代史的更一般性的(可能仍然是很偏向于一方面的)学说”,“成长阶段论的目的不仅是要生动地说明现代化的先后顺序的一致性,而且也同样地要说明每一个国家的经验的特殊性”。^③

罗斯托的杰出之处,在于他强调各个国家非经济因素的差异性,而这些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认为,“经济变化本身是政治与社会以及狭义的经济力量所引起的后果”,“根据人类的动机来说,许多最深刻的经济变化是人类非经济动机和愿望所造成的后果。人类动机是经济成长的基础”。^④可惜的是,罗斯托对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非经济因素都几乎没有分析。

研究现代企业制度并作出重要学术贡献的美国学者小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著有《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和《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等名著,是现代企业理论研究不可绕过的丰碑。钱德勒是历史学家,但他的著作没有一部是按时间顺序纪事,简单考证,或报流水账似的讲“历史故事”。他的研究是以大规模统计以及一手资料为基础,却主题先行,以演绎方法布局分析框架,做到了理论与历史的结合、归纳与演绎的结合、特殊与一般的结合。

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全覆盖地研究了到1917年为止资产额在2000万美元及以上的美国所有生产产品的企业,^⑤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市场依旧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创造者,然而现代工商企业已接管了协调流经现有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由于获得了原先为市场所执行的功能,现代工商企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因此,在美国,随着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出现了所谓经理式的资本主义。”^⑥并归纳出关于大型现代工商企业

①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斯和经济理论》,约翰·N. 德勒巴克、约翰·V. C. 奈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第2辑,第33页;D. C. North and 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XLIX, No. 4 (Dec. 1989).

② 道格拉斯·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前言”,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③ 罗斯托著,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页。

④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第8—9页。

⑤ 小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著,重武译:《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第402页。

⑥ 小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第1页。

这一“看得见的手”的8个论点。^①

钱德勒的《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更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美、英、德三国,把这三个主要工业国家“从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出现起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同样的一些核心工业内的各个公司的集体历史记录下来”,每个国家选定200家最大的制造企业进行整体性研究。他认为,“只有这种广泛基础的数据才可能提供表明制度发展的共同模式的比较,并揭示文化、经济和历史差别对制度发展的影响”。^②

以上这些西方经济学家所达到的高度,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也是可以达到的。中国学者应首先在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取得突破。因为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并不是从近代中国的实践或当代中国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和历史背景、制度条件都有很大不同,所以不宜直接、简单地把一些西方模型应用于近代以及当代中国,在应用时必须要有有一个创造性转化的过程,特别研究由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非经济因素所决定的不同的假设条件。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学派应该成为经济学理论界和经济史学界的共识。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iography and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Du Xuncheng

Abstract: Because the object of study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generalized theory” is western society,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non-economic factors were different than western society, the postulated conditions are discrepancy, so we cannot simply and directly copy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and analyze modern China, we must proceed applicability checkout, if possible, we need creativity transform of postulated conditions. The general objective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iography is that when we study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we should impose restrictions on theory, revise and restore, study non-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histori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 conditions and so on, these are abstracted by generalized theory. The economic theory is not unconditional, fixed and absolute, we should not use Chinese historical data to prove the correctness or general applicability of some western economic models, we should not imitate some papers issued by western scholars and provide a Chinese edition, we should not use modern economic theory to analyze ancient society, which had entirely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constraint conditions. The supreme goal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iography is the perfect fusion of theory, history and statistics, taking part in the initiation of economics theory that is appropriated fo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Economic Historiography, Mainstream Economics, Development Economics,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 Theory, History and Statistics

(责任编辑:高超群)

① 小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第6—12页。

② 小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著,张逸人等译:《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